



萧致治 主编

鸦片战争史

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 萧致治 主编

李增
杨卫
少军

鸦片战争史

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鸦片战争史

● 萧致治 主编

许增紘
李少军
杨卫东

著

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鸦片战争史

YAPIAN ZHANZHENGSHI

萧致治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方盛印务有限公司激光照排

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27.375 印张 12 插页 661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11-02811-4

K·202 定价(上、下):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陈锡祺

萧致治教授主编的新著《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一书，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我和事先有幸拜读过书稿，或者是对萧教授这项工作有所了解的各位朋友，都感到十分高兴。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鸦片战争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关于这场战争的著作已经出现了。一些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写书记述了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经历。这些侵略军军官的回忆录，对日后的研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不能说是完全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历史的著作。几乎与此同时，几位正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士大夫，满怀爱国激情撰写了关于这场战争的著作。最早的要数著名的学者魏源，当战争的炮声还在轰鸣时，他就根据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撰写《道光洋艘征抚记》（又名《夷艘入寇记》、《夷舶入寇记》、《夷艘寇海记》等）。这部书简明扼要地概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揭露英国殖民者的侵略罪行，鞭挞妥协派的误国卖国，歌颂爱国军民的反抗斗争。由于当时妥协派还掌握着军政大权，所以，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刊刻的《圣武记》一书只把《道光洋艘征抚记》列入篇目而没有收录正文。这部中国最早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史著，仅以不署

名的抄本流行于世。稍后，梁廷枏撰写的《夷氛闻记》，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刊行时没有署名。同治年间刊行的《中西纪事》，曾以大量的篇幅记述鸦片战争的始末，但刊行时作者夏燮把真名隐去，只署江上蹇叟。

魏源等人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完全是用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写成的。这样说，并不会贬低这些著作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到了20世纪，引进一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并以“鸦片战争”为书名的著作陆续问世，先后有刘彦的《鸦片战争史》（1911年）、武育干的《鸦片战争史》（1931年）、丁晓光的《鸦片战争》（1934年）、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1942年）等书。50年代以后，又有多种鸦片战争史出版，从1950年到1972年，共出了13种，但全部是篇幅不大的小册子。在一些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中，如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苑书义等的《中国近代史新编》，对鸦片战争都作了很有分量的论述。在我国的台湾省以及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出版了若干鸦片战争史著作，如增井经夫的《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1955年、1978年）、韦利的《中国人心目中的鸦片战争》（1958年）、张馨保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1964年）、霍尔特的《中国的鸦片战争》（1964年）、姚廷芳的《鸦片战争与道光皇帝、林则徐、琦善、耆英》（1970年）、陈舜臣的《鸦片战争实录》（1971年）、费伊的《鸦片战争，1840—1842》（1975年）、比钦的《中国的鸦片战争》（1976年）、颖里士的《鸦片战争》（1976年）、谭中的《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鸦片战争的起源研究》（1978年），尽管在50—60年代，在我国大陆整理出版了一批对研究鸦片战争来说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如《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筹办夷务始

末（道光朝）》等书，但是，没有一本能反映我国学者研究水平的鸦片战争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自 70 年代末以后，我国的学术事业开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在鸦片战争研究这个领域，也是硕果累累。除了大量论文之外，还出版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1982 年）、陈胜彝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1985 年、1990 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 年）等一批在学术上颇有分量和新意的著作。在国外，则有矢野仁一的《鸦片战争与香港》（1939 年、1990 年）、普赖茨克的《内部的鸦片战争》（1992 年）等书。此外，在广州、福州等地，举办过一系列研讨鸦片战争、林则徐或其他相关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在会上展开热烈讨论，促进了鸦片战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现在，萧致治教授新著的出版，毫无疑问是当前鸦片战争史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是 66 万言的皇皇巨著，附有地图和图片 30 多幅，可说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一部鸦片战争史，而且是一部水平颇高的学术专著。

首先，这本书是在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史学著作，尤其是像研究鸦片战争史这类涉及中国与外国复杂关系的著作，如果没有丰富的中外文史料作基础，就很难期望能全面、深刻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以往中国学者研究鸦片战争，外文资料利用得较少；反之，外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时，对中文资料的利用也难免有阙。但萧教授这本书，在收集、考证、利用中外文资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例如，以往的著作叙述禁烟运动时，多数偏重谈广东禁烟的情况，其他地方就只是简略介绍甚至一笔带过。本书则充分利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关于 1839—1840 年

各地禁烟的资料，因而对禁烟运动以至对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中国的论述就更加全面。在对很多事件的论述中，正是因为注意到吸取中外史料并加以综合比较，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论述，对事件以至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获得更接近历史真实的了解。

第二，这本书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成果，研究的视野广阔，角度新颖。作者并没有把鸦片战争仅仅看成是中英两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是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同时又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因此，本书除了用4章翔实地论述鸦片战争的经过外，前面用了5章详细叙述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源和历史背景，即战前300年的中西关系、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和英国的社会状况等，后面又用了4章论述了鸦片战争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鸦片战争既被置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又被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范围里加以考察，对经济、政治、军事、中外关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书中既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战前300年中西关系的发展变化，又突出了英国在“侵略的西方”中的主角地位；既从各方面分析了清朝统治的衰败，又对英国的社会状况作了必要的叙述。本书既重视宏观的研究，又重视微观的分析，结构严谨，主线清晰，论点鲜明。这样，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源、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及其产生的影响，就得到了全面的阐明。

第三，本书作者不囿于成说，从详细占有资料入手，对很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对诸如西方人同中国的早期接触、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即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鸦片泛滥问题的态度、鸦片战争开始的时间、英国对侵华战争的准备、讨论和决策、清政府在战争全过程战略和政策的变化以至战争中一些战役的具体过程等问题，

国内外学者往往众说纷纭。本书作者或在综合分析诸说之后，经过考究，择善而从；或对前人的研究作出重要的修正与补充；或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独到之见。这样，就使本书的论述与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令人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

从这部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识见和功力。我认识萧教授已 40 多年了，他从 1956 年至 1960 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其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勤奋的学习态度，当时就予以我很深的印象。毕业后他到了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工作，从事的又是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我们因为是同行的关系，有不少机会联系和见面。他曾对我谈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我也为他所取得的新成果感到高兴。萧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好几个领域都颇有造诣，而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着力尤多。有好几年，他协助姚薇元先生主持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课题，成绩显著；姚先生逝世后，他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成为武汉大学鸦片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他还组织人力，把国外一些研究鸦片战争的文獻翻译出版。当知道萧致治教授主持撰写鸦片战争史时，我就认为这是很恰当的人选。这部著作的完成，是他几十年孜孜不倦地研究鸦片战争的总结，也是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个学术领域的重要贡献。可以预期，这本书出版之后，将会在学术界受到欢迎和重视。

而且，这样一部高水平的研究鸦片战争史的专著，在 1996 年出版，除了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之外，还有不寻常的现实意义。因为在 1997 年 7 月 1 日，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占的中国神圣领土香港，将要回到祖国怀抱。读者通过这本书重温 150 多年前的历史，将会加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更加尽心尽力。因此，这部巨著可说是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份重要献礼。

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会尽善尽美，萧教授的这部著作恐怕也难例外。但萧教授是一位勤奋而谦虚的学者，在本书出版之后，他一定会继续与同行交流切磋，继续对有关鸦片战争的学术问题钻研探索。我期待萧教授取得更多的新成果。

1996年12月于康乐园

序

章开沅

武汉大学历史系是我国鸦片战争史研究屈指可数的重镇之一。已故姚薇元教授所著《鸦片战争史实考》，学风严谨，功力深厚，堪称开创之作。其后萧致治先生来武大任教，除研究辛亥革命成果斐然外，也致力于鸦片战争史的深入探索。1982年，姚、萧两位先生决定合写一部鸦片战争的大型专著，并从搜集、考订、分析中外史料入手，首先针对薄弱环节和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1985年，姚先生赍志以歿，但萧先生和几位年轻教师仍然继续从事此项研究。1987年出版的《鸦片战争研究》（论文结集），便是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此前后，他们还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以80万字的《鸦片战争前后史事纪要》书稿为基础）、《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和《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坚实的前期基础。以后又经过6年的漫长岁月，才完成这本《鸦片战争史》的定稿。即此一端已可见著者用力之勤与探究之深，与时下某些率尔操觚的应景之作不可同日而语。

本书副标题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作者的意图很明显，从纵向而言是把鸦片战争放在中国4000多年历史长河中作连贯性动态研究，从横向而言则是把鸦片战争放在当时世界环境和中国社会历史的总体中间作不同层面的剖析研究，而总起来说就是在“通”字上下功夫。这样就打破了过去把鸦片

战争当作单一政治事件研究的陈旧格局，为这一课题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本书对资料搜集下了很大功夫，除中外文档案文献外，还查阅了许多当事人记述、主要官书、相关方志和其他各种重要资料。同时又很重视资料的鉴别与考订，并非有闻即录，而是力求避免以讹传讹。例如广东《新安志》中有明正德元年（1506年）佛郎机人占屯门海澳的记载，恰好与布赖克利斯《中国与远东》一书“法国人于1506年最先来中国”的说法相吻合，不同于1517年葡萄牙人最先来华的传统论点。作者经过详密论证，认为“佛郎机”为当时中亚人对欧洲人的泛称，并非专指“法兰西”。法国在16世纪初甚少海上活动，不可能先于葡萄牙来华，布赖克利斯可能是把“佛郎机”误认为就是“法兰西”，因此仍以维持葡萄牙1517年最先来到中国这一传统说法为宜。

作者重视吸收以往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更立足于自己的独立研究，勇于作进一步探索并形成新的见解。例如对于弛禁、严禁两派的区分，就不囿于过去长期沿袭的成说，而是根据历史实际作更为客观细致的论述。对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也不是单纯歌颂赞扬，而是力求实事求是地剖析其局限性，并且比较全面地总结其历史经验。即使是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也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如其分的论述。如第一章（“早期殖民者的东来”）第二节的标题是“葡萄牙窃据澳门”，用“窃据”而不用“强占”，就是因为当时的明朝不同于19世纪中叶的清朝，当时的葡萄牙也不同于三个多世纪以后的英国，不能用近代“侵略——妥协”模式硬套300多年以前的历史，而葡萄牙占领澳门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最近在澳门访问时，当地有的学者即不满于内地某些学者对早期澳门史的简单化表述，他们认为对于当时葡文档案所陈述的一些实际情况也应该作为参照。我

想本书作者的客观态度与精辟论断当可赢得众多海内外学者的共识。

当然，对本书的最好评价应该是广大读者的直接反应，无须我在这里唠叨。不过致治盛情交读，又值薇元前辈九二冥诞，而香港即将于 1997 年回归，一扫百余年来的国耻，抚今思昔，感慨万千，聊缀数语，或可充序。

1996 年 12 月于桂子山

前 言

1840年，是中国人民永远不应忘记的一年。这年夏天，一支英国远征军，为了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和开辟中国市场，悍然对中国发动了“极端不义”^①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在英国历史上不过是一系列殖民侵略战争中的一次，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可是，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事变。由于这次战争，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被迫改变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开始丧失，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遭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一个延续约200万年的中华民族，再也不能沿着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前进，被迫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当时人们对此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已经意识到这是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有的称它为“千古奇变”。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中，社会小变革连续不断，但影响社会性质的重大变革，在鸦片战争前只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即夏代初年。那是一次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大变革，也即由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的变革。夏朝之前，我们的祖先在中国大地上休养生息，已度过了约200万年的原始社会生活。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社会上没

^①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

有剥削，没有压迫，一切财产归氏族或部落公有。人们的生活水平极端低下，但彼此过着平等相处、财产公有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夏代初期，劳动产品除供自己食用外，已有少量剩余。氏族或部落首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并由此逐渐演化为奴隶主，氏族或部落的其他成员则沦为供他们驱使的奴隶，也有一些人变成自由民。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不但占有奴隶的劳动产品，而且占有奴隶本身，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奴隶主残酷剥削奴隶的第一个阶级社会。这个社会中的奴隶劳动，无疑是极端艰苦的。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逃亡，甚至将奴隶扣上一副沉重的枷锁。广大奴隶不甘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为了争生存和自由，纷纷奋起反抗。在延续一千多年的奴隶社会中，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从未止息过。在奴隶们的不断反抗斗争冲击下，奴隶制度再也无法维持，残酷的奴隶制度终于最后崩溃了。

第二次社会大变革发生于距今 2500 年前后，即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次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经过奴隶不断反抗奴隶主、平民反抗贵族、新兴地主反抗奴隶制的斗争，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奴隶制衰落了，封建制兴起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渐代替了奴隶所有制。以地租为主的封建剥削形式渐次取代了直接占有奴隶的剥削形式。农奴（农民）的人身相对于奴隶来说有了一定的自由。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和奴隶相比均有一定的改善。新兴地主阶级经过和奴隶主的反复较量，逐渐夺得了统治地位。与社会经济、政治大变动相适应，文化思想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封建意识逐渐战胜了奴隶制观念。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奴隶制的残余尽管依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阶级社

会。它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才发生了带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即变为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由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历史大转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第三次大变革。和前两次社会大变革比较，其历史地位一样，但有许多自身的特点。

首先，所处的历史时代大不相同。前述两次变革，中国尚处于独立发展时代，几乎都是在和中国以外的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发生的；而鸦片战争爆发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几乎整个地球都卷入了新兴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国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的骚扰，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当时正面临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时势和前两次已大不相同。

其次，前述两次大变革，都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的大变革，除了社会内部矛盾斗争是其基础外，主要是由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结果。外力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虽然迟早要由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但肯定是若干年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已经动摇，其上层建筑也已腐朽，可是取代它的新兴力量，即新兴资产阶级尚未成长起来。

第三，前述两次大变革，从社会发展角度考察，都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巨大的历史进步；鸦片战争后的大变革，虽然也有社会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但主要是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制约。它不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而是历史发展的变态。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起了巨大的加速作用，却没有让中国本身的资本主义势力顺利成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刺激作用，同时又千方百计扼杀它，使它无法独立发展。封建统治势力在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下无法自立，

逐步和侵略势力相勾结，共同维持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

最后，经过前两次社会大变革，由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社会生产力有明显的进步，经济趋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提高；而鸦片战争之后，虽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生产技术被介绍进来，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残酷压迫人民的工具，不但使中华民族遭到了空前的民族浩劫，而且使全国人民受尽了折磨。人民生活非但无丝毫改善，而且破产流亡，朝不保夕，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在文化意识领域，一方面，封建文化大量保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思想，特别是洋奴买办意识，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总之，这次社会大变革，和前两次大变革有着显著的不同，这次社会大变革使中华民族的命运受到极其严峻的挑战，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

这样一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无疑是由鸦片战争引发的。鸦片战争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变革？鸦片战争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已往人们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把它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来研究，虽然也谈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影响，但很不深入，流于一般化。这显然与它在这场大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实际上，这场战争的爆发，从英国来说，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场战争之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也深藏于这些社会根源之中。只有联系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时势，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中外关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才能深刻阐明鸦片战争发生的必然性及其重大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在撰写本书时，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翔实考察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把它作为一次社会大变革来研究，把它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加以衡量，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范围内来进行探讨，以求揭